



探析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贾秀涛^{**}

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太复国主义几乎同时出现。在美国,不但国务院近东事务局里的阿拉伯专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且一些私人组织也积极开展反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其中以阿拉伯人事务研究所、美国犹太教委员会和阿美石油公司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活动最为突出。尽管他们参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迥异,但其目标是一致的。随着以色列的建国,标志着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终结,相反,这为之后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反以色列奠定基础。

20 世纪 40 年代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互斗争的关键时期。1942 年比尔特莫尔会议之后,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都认识到,巴勒斯坦的未来将由美国决定。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加强了他们的政治游说,以获得美国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也通过私人组织,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在美国,除了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呼声最高的与该问题利益攸关的几个非政府组织,比如阿拉伯人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Arab American Affairs, IAAA)、美国犹太教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 ACJ)和阿美石油公司(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ARAMCO)。但随着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杜鲁门总统对以色列的承认,20 世纪 40 年代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反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的消失,相反,在之后的历史中,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围绕阿以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与东西方冷战研究”(项目号:17ZDA2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贾秀涛,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冷战史、美国对外关系史、美国公共外交等。

冲突问题继续对美国中东政策施加影响,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的爆发。纵观国内外学术界,犹太复国主义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成果颇丰。^①但关注美国反犹太复国主义,尤其是直接针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果却很少。^②本文拟对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反犹太复国主义进行研究,尤其探讨了三个重要的私人组织在反犹太复国主义方面的目的、活动及影响等。通过探析这些私人组织在反犹太复国主义方面的努力,对我们更加全面的理解美国中东政策大有裨益。

一、犹太复国主义中心转移至美国

犹太复国主义中心原本在英国,但1942年“比尔特摩尔会议”后,其重心转移到美国。一战期间英国为拉拢美国和俄国的犹太人,宣布《贝尔福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1922年,国联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托管,并重申

① 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研究:Allon Gal, *Progression and Zionism: A Study in Interaction of Ideas and Social Background*,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s, 1976; [美]沃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阎瑞松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Mark A. Raider,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Zion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Hilton Obenzinger, “Naturalizing Cultural Pluralism, Americanizing Zionism: The Settler Colonial Basis to Early-Twentieth-Century Progressive Thought,”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07, No. 4, 2008; 刘精忠:《宗教与犹太复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有关犹太游说的研究:J. J. Goldbery, *Jewish Power: Inside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1996; Janice J. Terry,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Role of Lobbies and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Pluto Press, 2005; [美]保罗·芬得利:《美国亲以势力内幕》,武秉仁、戴克伟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美]约翰·米尔斯海默、斯蒂芬·沃尔特:《以色列游说团体与美国对外政策》,王传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弗雷德·A. 拉辛:《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张淑清、徐鹤鸣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杨阳:《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研究》,中西书局2016年版等。有关犹太人组织的研究:Lee O'Brien,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 and Israel*,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86; Michael Dobkowski, *Jewish America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汪舒明:《战后美国犹太组织的“群际关系运动”及其影响》,《史林》2017年第5期;汪舒明:《美国犹太组织与美以特殊关系的“危机”》,《西亚非洲》2017年第3期等。有关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研究:傅有德:《现代犹太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一部历史(1585~1990年)》,杨波、宋立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刘洪一:《犹太文化要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黄陵渝:《当代犹太教》,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潘光、汪舒明、罗爱玲主编:《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和影响》,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张倩红:《犹太文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张倩红:《犹太史研究新维度》,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孙晓玲:《美国亲以犹太社团的嬗变及其影响》,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等。

② 专门研究美国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专著非常少,较著名的有Thomas A. Kolsky, *Jews Against Zionism: The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 1942-1948*,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贝尔福宣言》。同年,美国通过《联合决议案》,声称:“美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任何可能损害巴勒斯坦基督教和所有其他非犹太社区公民和宗教权利的行为都不得进行,巴勒斯坦的圣地和宗教建筑和场所应得到充分保护。”^①1924年12月,美国与英国就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结束,此次会议,美国的目的是确保美国公民在巴勒斯坦拥有同国际联盟成员国一样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与英国代表和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对话中明确表示,美国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私营企业性的事业,仅此而已。^②可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因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强势存在,美国基本上没有介入中东,并且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也基本上是英国人,除了需要美国的私人和政府财政支援之外,似乎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需要美国。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支持的需求开始急剧增加。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的发展中逐渐意识到,如果想要给予犹太复国主义者充分的支持,那么势必会损害阿拉伯人的利益并与其产生对抗。于是,1939年英国改变了其巴勒斯坦政策,公布巴勒斯坦问题《白皮书》,规定:从1939年4月起,在5年之内接受7.5万移民入境;5年之后不再容许犹太移民入境,除非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此加以默许。并严格限制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土地购买计划。^③此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到的是让美国政府给予英国政府压力,让英国采取具体行动,而非美国直接参与。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推进,英国的势力日益衰落,犹太复国主义者也逐渐认为英国不可靠,一些人转向俄国,但绝大多数人在美国看到了希望。1942年,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主席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及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一起前往美国,参加5月11日在纽约比尔特摩尔(Biltmore)饭店举行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大会批准《比尔特摩尔计划》(Biltmore Program),呼吁承认犹太共和国和犹太军队,敦促将移民巴勒斯坦的责任从英国转移到犹太事务局,并谴责1939年的《白皮书》。^④尽管巴勒斯坦和美国的许多犹太人反对这一计划,但1942年11月,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总理事会的

① ESCO Foundation For Palestine, Inc, *Palestine: A Study of Jewish, Arab and British Policies*, Vol. 1,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252.

② Kermit Roosevelt, *Partition of Palestine: A Lesson in Pressure Politics*, New York: The Institute of Arab American Affairs, Pamphlet Number 7, 1948.

③ Charles L. Gedde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rab-Israel Conflict*, New York and London: Praeger, 1991, pp. 185-199.

④ ESCO Foundation For Palestine, Inc, *Palestine: A Study of Jewish, Arab and British Policies* Vol. 2,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1084.

一个委员会最终还是通过了该决议。至此,犹太复国主义中心真正由英国转移到美国,并获得迅猛发展。

比尔特摩尔会议之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迅速捕捉到公众对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同情,利用信件、报纸、广告、传单、广播、游说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犹太复国主义,甚至许多国会议员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与此同时,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积极参与其中。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部(The Division of Near Eastern Affairs, NEA)中的中东问题专家们意识到犹太复国主义的强大压力,遂成为美国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坚力量。^① 国务院近东事务部主要负责中东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当时其工作人数极少,这些中东问题专家在国务院内形成了一个亲阿拉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小圈子。他们与美国的阿拉伯学者或精通阿拉伯地区的专家保有密切往来。比如其主任华莱士·默里(Wallace Murray)不但是一名积极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1945年卸任后,主动加入了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私人组织美国犹太教委员会。^② 莫里的继任者洛伊·亨德森(Loy W. Henderson)也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近东和北非事务办公室里的中东问题专家们出于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最大化及美苏冷战的考虑,基本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正是这些人的建议,使得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始终避免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给予明确的承诺。但随着哈里·杜鲁门入主白宫,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们的建议不再那么见效,杜鲁门总统甚至对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的建议不满:“那些‘过分注重形式的小伙子们’实质上警告我小心一点。他们认为我真的一点不知道那里发生的情况。”^③相反,白宫顾问团的亲犹建议更能让杜鲁门接受。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了比先前更加激烈的角逐。

二、私人组织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与美国国务院内的反犹太复国主义遥相呼应的是一些在美国有着影响力的私人组织,他们凭借着与政府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领导者,不断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引导公众舆论。最典型的就是阿拉伯人事务研究所、美国犹太人委

① 1944年,国务院近东事务部更名为近东和非洲事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Near Eastern and African Affairs)。

② Daniel Rickenbacher, *Arab states, Arab Interest Groups and Anti-Zionist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 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Zurich, 2018, p. 150.

③ Bruce J. Evensen, *Truman, Palestine, and the Press: Shaping Conventional Wisdo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 p. 129.



员会和阿美石油公司。

(一)阿拉伯人事务研究所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与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犹太人强有力的游说、宣传等活动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阿拉伯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要苍白无力得多。出于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和比尔特摩尔会议的不满,在阿拉伯裔美国人菲利普·希提(Philipp Hitti)等人领导下,1944 年 11 月一批杰出的阿拉伯裔美国人创建了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Arab American Affairs, IAAA),希提担任执行董事,该组织宗旨是“培养美国与阿拉伯语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感情”^①,在美国为美国的阿拉伯社区和中东的阿拉伯人发声。该组织属于非政府组织,其总部设在纽约,毫无疑问,该组织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人强有力的臂膀。

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主要通过游说、公开发表演讲、与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建立友谊等方式来发挥其作用。比如,出于共同的利益,美国国务院近东北非事务办公室的劳伊·亨德森和阿拉伯使馆代表等出席了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举办的节日晚宴;国务院还就巴勒斯坦问题征求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的意见等。^② 其中较著名的是发生在 1945 年的游说活动。1945 年 9 月,希提任命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哈利勒·托塔(Khalil Totah)担任新的执行董事。在托塔的领导下,1945 年 10 月,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加入阿拉伯办公室(Arab Office)和阿拉伯公使馆(Arab Legation)抗议杜鲁门总统支持在巴勒斯坦安置 10 万犹太难民的活动中。“在昨日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明确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在欧洲各国推行民主”^③,一封来自其执行董事哈利勒·托塔的信中称:“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早于难民问题多年,(犹太复国主义)只是利用难民的困境作为‘政治目的的诡计’。”^④显然,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并未奏效。但我们不能否认其在反犹太复国主义过程中代表阿拉伯人利

^① Hani J. Bawardi, *Arab Americans from Syrian Nationalism to U. S. Citizenship: The Making of Arab America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4, p. 252.

^② Khalil Totah, “My Four and a Half Years in New York,” See Joy Totah Hilden, *A Passion for Learning: The Life Journey of Khalil Totah, a Palestinian Quaker Educator and Activist*, XLIBRIS, 2016.

^③ “ARABS DECRY ZIONISM; Group Here Tells Truman Jewish Problem Has Another Solution,”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1945.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④ “ARABS DECRY ZIONISM; Group Here Tells Truman Jewish Problem Has Another Solution,”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1945.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外,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还与阿拉伯公使馆和阿拉伯办公室有着密切的往来。早在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成立之初,其就引起阿拉伯公使馆的关注,埃及部长甚至邀请该组织代表团进行座谈会,想要拉拢其作为埃及的外国人代理机构,但该组织代表团婉言拒绝。阿拉伯办公室是在1944年10月第七次泛阿拉伯会议之后建立的一个阿拉伯宣传机构,在华盛顿、伦敦和耶路撒冷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挑战。其资金主要来源于阿拉伯政府,后来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伊拉克。其官方给出的组织宗旨是“为美国和英国公众提供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准确信息和正确观点,从而改善英阿关系和美阿关系”^①。阿拉伯驻华盛顿办公室1945年在美国司法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机构,其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各种活动减少美国对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支持。为了反犹太复国主义,阿拉伯办公室甚至不惜与美国反犹主义进行合作,并接受耶路撒冷的臭名昭著的穆夫提的控制,因违反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而于1947年12月被迫关闭。

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与阿拉伯办公室之间的关键联络人是克米特·金姆·罗斯福(Kermit·Kim·Roosevelt)^②。金姆·罗斯福是美国著名商人、军人、作家、探险家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的儿子,也是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孙子。他是一个积极的反犹太复国主义阿拉伯问题专家。他于1946年加入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的咨询部门,并在该部门的授权下与阿拉伯办公室进行密切接触,正如阿拉伯官方办公室主任塞西尔·侯莱尼(Cecil Hourani)所说,金姆·罗斯福为我们“在华盛顿和纽约的社会中,创造了很多机会”^③。尽管如此,亲阿拉伯的金姆不但挽救不了阿拉伯办公室的命运,甚至连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的被迫关停,他也爱莫能助。1950年5月,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正式关闭。其关停的原因,我们从1950年1月26日哈利勒·托塔写给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研究所全体员工的信中可以略知一二:“由于缺乏财政支持……很遗憾,事务所的工作将会终止。据我所知,在美国再也没有一个阿拉伯人事务信息中心了……”^④这是

① Rory Miller, *More Sinned Against than Sinning? The Case of the Arab Office, Washington, 1945-1948*,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2004, p. 307.

② 下文将统一称其为金姆·罗斯福或金姆,以区别于他的父亲和祖父。

③ Hugh Wilford, *America's Great Game: The CIA's Secret Arabist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asic Books, 2013, p. 85.

④ Hani J. Bawardi, *Arab Americans from Syrian Nationalism to U. S. Citizenship: The Making of Arab America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4, p. 292.



阿拉伯裔美国人事务所最后一次与员工的正式沟通,显然缺乏资金是其寿终正寝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强大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对该组织施加的压力。从此,阿拉伯裔美国人在美国政治事务中几乎失语 17 年,直到 1967 年阿拉伯美国大学毕业生协会 (Association of Arab American University Graduates, AAUG) 的成立,才改变了这种状态。

可以说,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道路上,虽然阿拉伯裔美国人做出了努力,但是在强大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政治压力面前,阿拉伯裔美国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努力还是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美国阿拉伯人的事业就没有支持者,相反,另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比尔特莫尔会议不满的美国犹太社区内部私人组织也正在崛起。

(二) 美国犹太教委员会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美国犹太人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犹太复国主义者、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而美国犹太教委员会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 ACJ) 是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犹太人社区内部唯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为了回应美国国内激增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及改革派犹太教内部的分裂,1942 年 6 月,90 名拉比中的少数人在大西洋城召开了一次“非犹太复国主义”的拉比会议。^① 事实上,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了建立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犹太教委员会的意见。随后,改革派犹太教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创立了美国犹太教委员会,并宣布要发起一场大规模运动,把犹太人定义为宗教团体中的一员。最初,美国犹太教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改革派犹太教拉比,但该组织不久之后就在其执行主管埃尔默·伯杰 (Elmer Berger) 等人的领导下变成了世俗性的组织,以反犹太复国主义为主。1943 年,美国犹太教委员会在《纽约时报》上阐述了其组织目标。重点在于反对在巴勒斯坦或其他任何地方建立犹太民族国家,认为这不是解决犹太问题的实际办法。希望最终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主自治政府,“在那里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将被公正地对待”^②。随着事态的发展,1946 年,美国犹太教委员会主席莱辛·J·罗森沃尔德 (Lessing J. Rosenwald) 进一步指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

^① See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and International Jewish Press Service bulletins, June 2-3, 1942 and New York Times, June 3, 1942,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②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Statement of the Council for Judaism, New Jewish Group appeals to Allies” *New York Times*, Aug 31, 1943,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New Jewish Group appeals to Allies,” *New York Times*, Aug 31, 1943,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平等的民主国家。”^①正是这样的组织宗旨,指引着该组织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活动。

大量来自富有者的捐助,让美国犹太教委员会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包括发送宣传性的小册子、信件和电报给有影响力的犹太人或非犹太人,策划在非犹太人面前的公开演讲,采购主流媒体报纸的整版广告,组织当地分会的活动,给政府官员提交备忘录,参加国会委员会的听证会,访问接触的政治家、教会人士和公民领袖等等。^②由于意识到犹太复国主义拥护者对“双重忠诚”或对美国缺乏爱国主义的指责感到恼火,委员会的成员们不遗余力地灌输一种印象,即犹太复国主义危及美国犹太人的地位。犹太复国主义者“首先是巴勒斯坦人,然后才是美国人”,他们捐赠给犹太联合募捐协会(United Jewish Appeal)的钱,将会被用于“外国政府的目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意味着,所有美国犹太人最终将不得不搬到巴勒斯坦,或者,最好是,在美国有自己的“犹太人区”。例如,拉比路易斯·沃尔西(Louis Wolsey)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作证时向国会传达了“双重忠诚威胁”的信息。他警告说,一个犹太国家将使美国犹太人的地位变得“模棱两可”,这将意味着“我将被视为一个总部设在巴勒斯坦的国家的一员,我可能会受到怀疑、疏远,甚至可能更糟糕”。^③“双重忠诚”问题,成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重要论调。美国犹太教委员努力说服美国犹太人,想让他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与美国理想背道而驰,与犹太教的普世宗教性质不符。尽管如此,面对庞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美国犹太教委员会在犹太社区内部越来越被孤立。因此,他们不得到处寻找支持,而美国国务院中亲阿拉伯主义的中东问题专家则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此外,美国犹太教委员会还利用人际网络对外交决策施加影响。乔治·利维森(George L. Levison)是美国犹太教委员会在国务院圈子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利维森是圣佛朗西斯科德裔犹太人贵族后代。1943 年秋到 1945 年春,利维森在开罗任职,担任美国中东的经济运作中心詹姆斯·兰迪斯(James M. Landis)的助理。兰迪斯在中东的主要责任是监督美国与英国中东供应中心的合作,协助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管理经济事务。1945 年,利维森被任命为伦敦联合国救济和康复总干事办公室(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① Robert W. Potter, “Rosenwald Group Asks Parley Voice,” *New York Times*, Aug 27, 1946,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② 参见美国犹太教委员会记录(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 Records, MS-17),馆藏于美国犹太人档案馆(American Jewish Archives, Cincinnati, Ohio)。

③ Samuel Halperin, “Zionist Counterpropaganda: The Case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 *The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41, No. 4, 1961, pp. 450-463.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 特别助理。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利维森与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洛伊·亨德森和金·罗斯福等人都有着亲密的关系,尤其与金姆·罗斯福,因其在开罗工作期间与金姆·罗斯福同居一屋而成为终身密友。利维森与金姆、艾奇逊、亨德森和其他外交关系方面的专业人士的友好关系,使得美国犹太教委员会与国务院的互动变得更容易些。也是利维森将美国犹太教委员会的执行主管埃尔默·伯杰引荐给国务院,并与金姆·罗斯福建立联系。1947 年 6 月,乔治·利维森在一封给埃尔默·伯杰的信中表示,他有兴趣让金姆·罗斯福参与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47 年 11 月份,美国犹太教委员会分会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邀请金姆·罗斯福到其分会休斯敦演讲,为委员会进行辩护,使其免受反犹太主义的指控。^①后来,金姆·罗斯福先后于 1948 年和 1949 年建立“圣地正义和平委员会”(Committee for Justice and Peace in the Holy Land, CJP)和“圣地紧急联络计划”(Holy Land Emergency Liaison Program, HELP),这两个都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私人组织。

(三)阿美石油公司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ARAMCO)是美国 20 世纪 40 年代反犹太复国主义典型的利益集团。1933 年,美国企业在英国石油大亨杰克·菲尔比的帮助下,第一次打入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行业,建立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该公司是狂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它在沙特的石油利益令其担心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会损害其商业运作。1941 年,美国政府内部首次发出警告,称美国正从石油出口国转变为石油进口国。1943 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进行的一项研究评估,指出海湾地区国家的石油储量规模几乎是美国的 3 倍,其中沙特阿拉伯所占份额最大。^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东石油的需求更大。美国计划向欧洲提供石油,以促进欧洲经济复苏,防止苏联的入侵。^③这使沙特阿拉伯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美国加州标准石油公司的沙特子公司),获得了对美国战略计算的最高影响力。该公司自建立以来,一直热衷于保持美阿关系的良性发展,它曾警告美国国务院,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将危及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尤其会威胁到其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① Hugh Wilford, *America's Great Game: The CIA's Secret Arabist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asic Books, 2013, pp. 84-89.

^② I. H. Anderson, *ARAMC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A Study of the Dynamics of Foreign Oil Policy, 1933-19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7-38.

^③ Michael Joseph Cohen, *Truman and Israe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94.

及石油特许权。20 世纪 40 年代末,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副总统詹姆斯·杜斯(James T. Duce)定期与美国国务院高层进行对话。1945~1948 年,杜斯与国务院近东和非洲事务部部长洛伊·亨德森保持特别密切的关系。^① 杜斯还在华盛顿创办了一个政府关系办事处,其职能类似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国务院,模仿战略情报局开罗分局的管理体系。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内部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无处不在的威廉姆·埃迪(William A. Eddy),他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顾问。埃迪与中东的渊源很深,他出生于传教士家庭,在普林斯顿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一战期间在海军陆战队服役。1923~1928 年,他在开罗美国大学担任英语系主任,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担任纽约州立大学校长。1941 年,他重新入伍海军陆战队,并在信息协调办公室和其继任者战略情报局北非事务部中都获得了很高的威望。他继续担任开罗美国海军武官,并在 1943 年得以在国务院任职。不久后,他被任命为小詹姆斯·穆斯(James Moose, Jr.)部长的特别助理,并且在 1944 年 8 月被任命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特派公使和全权公使。在 1945 年 2 月罗斯福—伊本—沙特会议上,艾迪以阿拉伯语、英语翻译的身份短暂成名。二战后,他先后任美国驻也门外交使团团长,国务卿特别助理,负责改组研究和分析处。1947 年 10 月,他辞去了政府职务,理由是他认为国会给新成立的情报机构的拨款不足。然而,事实上,他是对杜鲁门政府不接受阿拉伯学者们的观点表示不满,因而辞职。不久后被任命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顾问,负责组织该公司在华盛顿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游说活动。艾迪可以说是美国官员中最杰出的一个,他从政府部门直接进入沙特阿美利润丰厚的高级职位。

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内部有不少像艾迪这样的人物,不用说,沙特阿美公司对这些前政府官员在地质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不感兴趣,而是对他们与阿拉伯领导人的长期接触感兴趣,更感兴趣的是他们与政府有影响力的官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经常派埃迪等高管到中东进行“考察之旅”。他们一回来,就会通过公司的公关部门发布有关美国在中东利益即将遭受灾难的危言耸听的消息。美国国防部的文职和军事部门甚至也会认真听取和研究了艾迪等人的意见。虽然他们都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但是因为他们对中东地区的经验和语言技能,使得大多数美国人承认他们的专家地位,毕竟中东在那个年代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是个未知地域。

^① Michael Joseph Cohen, "William A. Eddy, the Oil Lobby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0 (1994), pp. 166-168.



三、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美国外交

从 1942 年犹太复国主义中心转移到美国开始,美国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就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旨在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尽管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其目标却是一致的,也正因为,他们才能与国务院尤其近东和北非事务办公室主任洛伊·亨德森等人取得密切联系。在这些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菲利普·希提、金姆·罗斯福、埃尔默·伯杰、威廉姆·艾迪等人的身影。他们活跃于各自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之中,因共同目标逐渐结成密切的私人网络,不断影响公众舆论,对抗犹太复国主义者游说。需特别指出,这些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不是在国会注册的游说组织,相反,都是些私人组织(或亦可称为非政府组织)。

事实上,在 20 世纪 40 年代,除了国务院近东和北非事务办公室,战略情报局及其继承者中央情报局的阿拉伯问题专家往往都是美国反犹太复国主义私人组织的盟友,从上到下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决策。尽管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和军方一直竭力说服杜鲁门总统不要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但在白宫顾问团以及总统选票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杜鲁门总统于 1946 年秋在犹太人赎罪日前夕,宣布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犹太国家的概念。不久,美国犹太教委员会主席莱辛·J. 罗森沃尔德给杜鲁门总统写信,提出放宽美国移民法,以援助流离失所者。^①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局势日益恶化,犹太人对英国目标的恐怖袭击,也加速了英国将其权利转移给联合国。围绕巴勒斯坦分治案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又进行了激烈的角逐。比如,美国犹太教委员会甚至给联合国递交了 27 页的备忘录,断言“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将对全世界的犹太人有害,并将危及圣地的和平与安全”^②。阿拉伯人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哈利勒·托塔在《纽约时报》刊文提出五点建议,拒绝巴勒斯坦分治。^③1948 年 5 月 14 日,杜鲁门政府宣布美国承认以色列政府,这标志着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失败。随后,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公共媒体中几乎成为“失语者”。《休斯敦纪事报》一篇文章指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压力控制了美国媒体

①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Anti-Zionists Urge U. S. Take Refugees,” New York Times, Nov. 27, 1946,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② George Barrett, “U. N. is Asked to Bar Jewish State by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 New York Times, Jun 9, 1947,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③ “Against Palestine Plan,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oly Land Feared in Backing Partition,” New York Times, Sep. 10, 27, 1947,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对巴勒斯坦的报道。“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在于,如果在这里很少或没有代表阿拉伯人利益的声音,鉴于中庸之道,只听一种声音,相信这一问题只有一个方面是严重危险的,因为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两面性。”^①这或许是金姆·罗斯福等人创建新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原因所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美国犹太教委员会、阿美石油公司及新建立的反犹太复国组织继续与美国国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抗,比如美国中东之友(American Friends of Middle East, AFME)成为这一时期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力量,继续围绕阿以冲突问题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

^① Letters to The Times, “Arab Stand on Recognition: Concerted Effort to Prevent Hearing of Arab Case is charged,” *New York Times*, May 28, 1948,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